

知识分子年龄“断层”的症结和对策

我国高等学校在“文革”期间中断正常招生11届,大学毕业生的年龄分布呈现“断层”。如果按照现行的退休政策“一刀切”,90年代将面临知识分子青黄不接的严重状况。

一、大学本科毕业生这个层次的“断层”,已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。

解放前,每年大学招生最多不到3万,随着50年代高教的大发展,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加,直至“大跃进”导致1963~1965年普通高校每年毕业生约20万,达到了高峰。相应地1936年出生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超过10万,约为5年前(1931)年出生的3倍,1938~1941年出生的四个年龄组共达50万人左右。1951年出生的只有1万人(基本上是1977年恢复招生后入学的)。1977年大学恢复招生,大学毕业生拥有量迅速回升,1960年出生的约10万,1961年出生的超过20万,1966年及以后几年出生的将稳定在每年30万人左右。

近年来,我国成人学历教育发展很快,每年招生数大体与普通高等学校相当,但主要(约90%)是专科层次,而其中少量本科层次的又大都还是师范类(中学教师进修),显然,对改变本科学历专门人才的年龄结构没有明显的效果。由于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,即使单从量的方面看,用成人学历教育来填补本科毕业生断层恐怕也是不现实的。

二、90年代将出现的“青黄不接”景象

如果按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(男60、女55岁)一刀切,到本世纪末将有115万大学本科毕业生陆续退出工作岗位,占全部(1960年及以前出生的)本科毕业生(220万)的52.3%。余下105万人中,年龄较长的50.4万人又因为“文革”而不同程度地未完成规定的学业,另外43万就是“文革”后恢复招生入学的年轻人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已达退休年龄的10余万人和即将在90年代陆续退休的100万人包括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中的骨干。笔者注意到,从1952~1960年的9年间,除1955、1957两年外,普通高校招生数均显著超过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数,加上其他原因,这批毕业生的素质也有参差。

如果这批人退出第一线,“断层”由谁来填补?按照年龄的优势,自然会首先想到正好有大学专科层次的高峰与之互补,现实的情况也正是如此,在“年轻化、知识化”的推动下,已有大批的大专毕业生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和高级专业技术岗位。但是,从总体上来说他们毕竟与退下去的一批不属同一层次,难以从实质上解决“青黄不接”的问题。我们知道,1946~1958年这13年中出生的94万持有大专毕业证书的人主要是“文革”中的“工农兵学员”。这批人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参差不

齐。因此,从总体来说,如果由专科层次的这一批人来接替下来的本科层次的班,难免造成骨干队伍素质的普遍下降,甚至影响我国向21世纪上半叶的正常过渡。

由大学本科毕业生来接替行不行?“文革”以后新培养的,加上90年代陆续毕业的,到2000年累计将超过600万人,数倍于退下去的,数量上当然不成问题。问题在于年龄。这些大学毕业生到本世纪末平均三十来岁,较大的(1960年出生的)也不过40岁。这批人中无疑会涌现出有才华的骨干。但是,从现状考虑,很难设想中央国家机关和一个成百万、上千万人地区的主要领导骨干主要由40岁以下的年轻人担任;在可能预见的境况下,也很难设想在今后10年内,在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中培养出国家大中型企业、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中成套的、比较成熟、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领导层和专业带头人。

三、出路在于采取求实灵活的退休政策,充分利用现有人才资源

解放后我国人民的平均期望寿命增长很快,据世界银行《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》提供的数据,1988年我国人民出生时的平均期望寿命已达70岁,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结果,1981年我国55岁的女性平均期望寿命还有23岁,60岁的男性平均期望寿命还有16岁。达到现有法定退休年龄的人,绝大部分到2000年将仍然健在,其中相当一部分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如果采取求实、灵活的退休政策,改善管理,精心甄别,使那些有条件的骨干不受年龄限制(当然也不受学历限制),视需要可继续担任县级以上各级政府、大中型企业及大中学校的第一线领导骨干,继续担任教学、科研第一线的骨干和带头人,90年代青黄不接的危机可望迎刃而解。到21世纪头10年,届时40来岁(人的近50岁)的骨干大批成熟,也就不难完成世纪之交的接续转换了。

从长远看,随着“人口老龄化”的加剧,法定退休年龄也应从长计议。如以上述1981年的期望寿命计,则现有男女大学毕业生(一般23岁参加工作)达到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后的期望寿命将分别为服务年限的43%和70%,一般劳动者以20岁参加工作计,退休年限与服务年限的比值也分别高达40%(男)和66%(女)。这种状况,不但对社会劳动力是一种浪费,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“金字塔”不复存在(变成人体上下一般粗),还会逐渐给社会造成不堪的重负。联合国、国际通行的劳动人口的概念已到65岁,许多国家、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比我国高得多,据说台湾中学教师的“强迫退休年龄”也是65岁。适当(有区别地)延长法定退休年龄,一方面有利于加快经济社会的发展,另一方面可以减轻社会负担。

(摘自《群言》杂志,1991年第4期,作者 周贝隆)